

近代中国人物

第三辑

《近代史研究》专刊



JIN DAI ZHONG GUO REN WU

87
K250.6
79
D:3

《近代史研究》专刊

近代中国人物

第三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《近代史研究》编辑部编

本辑主编 夏良才 曾景忠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

B

358253

责任编辑：刘世龙

封面设计：姜 梁

近代中国人物 第三辑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印张：15.875插页：4字数：401千

1986年10月第一版

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书号：11114·102 定价：2.90元

《近代史研究》专刊编委会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丁守和 宋士堂 侯宜杰 钱 宏
夏良才 梁尚贤 曾景忠

目 录

文廷式述论	刘 方(1)
左宗棠的建军和治军思想	王天奖(35)
论安庆失守前后陈玉成的军事得失	苏双碧(52)
王韬与中西文化交流	夏良才(77)
康有为《教学通议》析	吴根梁(113)
略论戊戌前后的经元善	虞和平(142)
荣禄与义和团运动	李文海 林敦奎(158)
章太炎与《民报》	王有为(191)
清末台谏中勇于同权奸斗争的“三菱公司”	侯 毅(208)
赵凤昌述论	陈时伟(246)
阮啸仙思想研究	张江明 刘林松(282)
俞秀松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	罗征敬(310)
郭松龄的历史评价	武育文(346)
论陈济棠在广东的经济建设	元邦建(381)
冯玉祥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	陈汉孝(411)
李济深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	姜 平(452)
王明年谱简编	周国全 郭德宏(471)

文廷式述论

刘 方

文廷式是在晚清政治中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，他的政治命运关系到晚清史上几起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尤其是与戊戌维新变法的成败密切相关。以往，史学界对文廷式研究甚少。本文拟对文廷式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概貌展开论述。

一、从科场风波到帝党中坚

文廷式(1856~1904)，字道希，号芸阁，晚号纯常子^①。江西萍乡人。因其祖父、父亲在广东做官，自幼生长在广东。文廷式的祖父、父亲都是举人出身，官至知州，属统治阶级的中层官僚。但其祖父和父亲都早逝，所以，文氏家境不富。文廷式十八岁(同治十二年)始应顺天乡试，不售，开始自谋生计。他先后为总兵吴长庆、广州将军长善、两广总督张树声做过幕僚。其中，为长善幕僚对文廷式以后的官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。长善嗣子志锐与其弟志钧，当时随长善在广州。他们与文廷式结交，彼此相契。志锐二兄弟有两个妹妹，就是后来的珍、瑾二妃，当时，她们也

^① 文廷式字一作道熾、一作道溪，号一作云阁，又号芗德、罗霄山人、菩提流支等。

在广州^①。

光绪八年，文廷式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，中式第三名。由于他博闻强记，擅诗词骈文，“誉噪京师，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”^②，成为当时都中清流瞩目、结交的对象。与王懿荣、张謇、曾之撰一起被人称为“四大公车”。后来的帝党骨干沈曾植、沈曾桐、陈炽、盛昱等人，都成为文廷式的知友，黄遵宪、江标、皮锡瑞等九十年代维新运动中的知名人士，也与文廷式订交。

文廷式中举以后，几次参加会试都未能登第。光绪十五年，帝党领袖、后清流宗主翁同龢主持内阁中书考试，使文廷式名列第一。次年，在进士考试的复试中，翁同龢，潘祖荫力主把文廷式的卷子列为第一。殿试时，翁同龢又颇费力气地拔文廷式为榜眼。随后，他被授职翰林院编修，具备了跻身后清流、帝党的资格，成为“翁门六子”之一。

翁同龢大力延揽文廷式，自然有其目的。在1884年甲申事变中，慈禧大换军机，黜滴前清流，废止言路，使朝政完全控于自己之手。致使清廷贿赂公行、风气日坏。此后几年，光绪亲政的时刻渐近，但慈禧却不愿放松手中的权力。为帮助光绪从慈禧手里夺过统治权力，以翁同龢、潘祖荫为首的光绪近臣，开始组织

① 许多涉及珍、瑾二妃的史料或回忆录，都说文廷式客长善幕时，曾“授二妃读”。据《文廷式年谱》（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八二年第四期，以下简称《年谱》）的作者钱仲联先生考证，文廷式客长善幕当在光绪三年，当时，瑾妃才四岁，珍妃二岁，不可能“受学”于文廷式，较为可信。但钱先生引冒广生言说，“先生（指文廷式）与志锐世交，二妃称先生为三哥，授读非事实也”。考长善同治八年到广东将军任，志锐兄弟和珍、瑾二妃之父长叙（曾为户部右侍郎，长善的胞弟）光绪二年因在康熙皇帝忌日嫁女，被御史邓承修奏参丢官，所以志锐兄弟姊妹都随长善在广州。长善在光绪十年离任回京，（在广州前后二年）二妃相从。文廷式在光绪十年后，因赴京参加会试。常住京师，来往长善家是必然之事，二妃或许常向文廷式问字求教。以此，二妃称文廷式为师，亦未尝不可。魏元旷《光宣金载》（《魏氏丛书》本）云，二妃“将入宫，居志锐家，师文廷式请授文”。

② 《昭萍志略·人物志》。

后清流，主持风议，与当权的西太后及其心腹们隐然相峙。翁同龢极力想培养光绪为独操政权的君主，并物色人才，进入翰林、御史之列，控制言路，利用已有的一点主持科场的权利，为自己“植党”、充实队伍。

此外，文廷式在清廷还特别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厚遇。甲午年，清朝举行了翰詹考试，阅卷大臣未阅卷之前，光绪“出一硃条示阅卷大臣，谓文廷式可置一等”^①。结果，文廷式以翰詹考试第一名升为侍读学士，授日讲起居注官，官品连升三级，可谓“圣眷优渥”。文廷式能够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宠，一方面由于珍、瑾二妃在光绪面前屡称其才^②，而翁同龢也曾任在光绪跟前对文廷式“揄扬备至”^③；另方面，光绪也想在自己周围提拔一批亲信。

光绪二十年，日本向清朝挑起了甲午战争，慈禧和掌握军权的李鸿章主张对日妥协。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们围绕光绪组成帝党，公开反对后党、淮系。在斗争中，文廷式成为帝党的中坚力量，他上奏光绪，要求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好战争的准备，“谋所以扼要制人之术，无使失算于前，复受侮于后”^④。

战争还未开始，文廷式就感到，李鸿章决不能领导一场使中国取得胜利的对外战争。他在上折中指出，“李鸿章立功之始藉资洋人，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……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权归于赫德，北洋之兵权制于德璀琳，故一有变端旁徨而罔知所措，必然之理也”^⑤。战争开始后，他建议派知兵大臣到前线去督战，因

① 《掌固零拾》卷三。文廷式致于晦若函谈这次考试，也说“未阅卷前，硃笔特写文廷式一等五字交下。”（《芸阁先生书牍》，见《文芸阁（廷式）先生全集·奏议·书牍·杂著》，以下简称《全集·书牍》，台北文海出版社，1975年）。

② 费行简《慈禧传信录》（崇文书局1918年版）94页。

③ 《掌固零拾》卷三。

④ 文廷式《奏为敬陈管见折》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，见《全集·奏议》。

⑤ 文廷式《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》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，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《中日战争》（以下简称丛刊本《中日战争》）二，608页。

为李鸿章不可信赖：“李鸿章一味求和而朝廷责之以战，实非本意……夫上、下不一心而强与敌人从事，未有能济者也。”^①说明他对李鸿章的投降本性看得很清楚。当时，帝党主张倒李鸿章，起用恭亲王奕訢，文廷式领导翰林院翰林联衔上奏，要求让奕訢重新参政并参劾了李鸿章。《马关条约》签定后，文廷式上书争言和约不可从，要求皇帝下诏“言尺土一民，皆当与倭为仇，永不复言和议”，建议迁都、废约、再战^②。

在这场伴随帝、后党争的和战之争中，翁同龢在清廷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主战，文廷式和张謇是翁氏主战的谋士^③，而实际上，文廷式是帝党出面组织斗争的领导者。文廷式自己有一段话，直接道明了这一点：“总署事极秘密，余则得闻于一、二同志，独先独确，因每事必疏争之，又昌言于众，使共争之。尝集议具稿，时有为余危者，余曰：‘愿执其咎，不敢让也。’”^④文廷式是一个敢于直言的爱国者。战争过程中，后党推行的投降政策，常使他义愤填膺，抑制不住地放言攻击后党。他曾参劾孙毓汶（在军机处代表慈禧意旨主和者），以致慈禧说他“语涉狂诞”，并恶狠狠地说：“事定，当将此辈整顿。”^⑤整个后党对文廷式都非常痛恨。

文廷式和帝党的一系列活动，没能阻止后党的投降步伐。但是，伴随着这场战争而进行的帝、后党争，并不是没有是非可言

① 文廷式：《奏为战事已开，请严飭在事大臣力祛壅弊折》，见《全集·奏议》。

② 文廷式：《和议难成请速断大计以抒天下之愤折》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，见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（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）卷三十七。

③ 《文廷式年谱》的作者钱仲联先生说：“先生（文廷式）与季直（张謇）皆翁尚书门下士，尚书主战之论，二人阴实主之。”钱先生并言“翁尚书为余之舅祖，此事余闻之庭训。”考翁同龢日记，甲午、乙未年，张謇、文廷式频繁拜谒翁，并与之密谈。例如，甲午年七月十八日：“……归后，文芸阁、张季直先后来谈，时事可怕也，骇耸人骨，抵晚始去。”

④ 文廷式：《闻尘偶记》，见《近代史资料》1981年第一期。

⑤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册三十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。

的。帝党的斗争，多少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反抗外国侵略的要求，表现了帝党爱国主义的思想特点。文廷式为了反对后党投降卖国而不怕罢官落职的行为，值得肯定。

甲午战争失败了，地大十倍之中国，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，这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以很大的刺激。一直希冀整饬朝政的帝党，在甲午战后出现的维新热潮中，普遍倾向维新。

文廷式和帝党们频繁地筹议改革政治之法。据戊戌老人张元济回忆，甲午战败使“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，觉得不能不改革了。丙申年（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）前后，我们一部分同官，常常在陶然亭聚会，谈论朝政。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，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，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。……”据张元济说，参加者有文廷式、陈炽、沈曾植、沈曾桐、徐世昌、汪大燮等人^①，多数是帝党骨干。文廷式是这些集会的组织者。但是，由于帝党们的思想水平不一，他们虽倾向维新，但对如何改革却没有具体、一致的办法。清流们一贯好夸夸其谈，议论常常不着边际。松筠庵，是帝党们常聚会的另一个地方。费行简曾参加过这里的集会。他说，文廷式“日集京朝官松筠庵，论朝政得失。予亦尝赴其约，然所论多迁谪官吏事，罕及大计。予笑曰：此袭东林而加厉者，后谢不往。”^②把这种集会比做东林党的集会，一方面，说明了集会的政治性，另一方面，又说明帝党对改革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。文廷式对改革虽有所考虑，却也还没有成熟的想法。

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方案，使帝党看到了救亡的出路。

康、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，对帝党开明的政治主张一直较感兴趣。甲午战争中帝党主战，赢得了维新派的支持。光绪二十一

① 张元济《戊戌政变的回忆》，见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323页。

② 《慈禧传信录》94～95页。

年四月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，呼吁拒和、迁都、变法，唱和了帝党的主张。公车上书比帝党拒和的主张更高明之处在于，提出了改造中国、用带有资本主义化的措施改造封建制度的维新变法方案，给了帝党极大的影响。

无权无势的维新派，从帝党们倾向维新的行动中，看到了实行维新变法的捷径。他们积极谋求与帝党联合，共同对付顽固守旧的后党。帝党同时也在寻找与维新派联合的机会，除了改革封建政治的真诚愿望外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，通过这种联合，加强他们的实力。甲午战争中，帝党在党争中受到了打击。光绪二十年十月，慈禧革珍、瑾二妃妃号，滴其兄——帝党骨干志锐往乌里雅苏台。十二月，极力主战的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。更令帝党担忧的是，当时京中竟有西太后要废除光绪的传闻^①。战后，后党把卖国条约的签定归罪于帝党“主战误国”，并酝酿弹劾文廷式，文廷式只好告假南归。帝党要利用战后全国人民对后党投降派的痛恨，重新部署。他们需要维新派的勇气和具体办法。

还在光绪二十年七月，给事中余晋珊弹劾康有为“惑世诬民，非圣无法”，要求焚《新学伪经考》，禁止康招收弟子。文廷式与帝党们一起致电广东提学史徐琪营救^②，表现了帝党对维新思想的倾向。战后，维新派和帝党两派人物频繁往来，商讨改革大计。文廷式积极与康、梁结交。梁启超曾评价文廷式：“能言传教”，“此人自是可人也”^③。翁同龢屡向光绪保荐康有为。

① 《张謇日记》（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月八日：“又闻慈宁为毅庙（同治）立瑞王之孙溥伦为子。瞻望北辰，忧心如捣。”小横香室主人辑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中“光绪帝之几废”一段（见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271～272页）记载文廷式甲午战后劝刘坤一阻止废立之事。

② 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见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128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与穗卿足下书》，见丁文江、赵丰田编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）48页。

帝党与维新派正式、公开的合作形式，是开办强学会。

维新派把开办学会，看作是维新运动的关键问题，认为“今欲振中国，在广人材；欲广人材，在兴学会”^①，开学会以达到“开风气”、“开知识”、“合大群”的目的。

文廷式是赞成开学会的。他认为，外敌当前，内治不修，只有开学会，团结同志，才能万众一心，共同对敌。他把当时“人材不振”，归咎于“国初，禁立社，禁学会”^②。战争期间，文廷式在松筠庵等地方“广集同志”，商讨对策，和战后帝党的集议，实际上具备了会的雏形。

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底，文廷式假满回京。此时，为创办强学会作准备，康有为和帝党成员陈炽在京创办了《万国公报》。“报开二月，舆论渐明。”^③康有为认为条件成熟了，准备开强学会，但遭后党大嫉。沈曾植、文廷式等人劝康有为离京。八月底，康有为前往上海去开办强学分会，留下梁启超办会务。十月初^④，强学会正式成立。陈炽、文廷式、沈曾植、沈曾桐为学会的骨干分子，梁启超、汪大燮办会报《中外纪闻》，李鸿藻、翁同龢、孙家鼐都对学会予以大力支持。强学会“每十日一集，集则有所演说”^⑤，它的政治目标是“谋政治之改革”。学会广储各类新书、地图、科学仪器，邀人参观，传播资本主义文化。梁启超说强学会“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”^⑥。它实际是帝党与维新派联合的政

① 梁启超：《论学会》，见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375页。

② 文廷式：《闻尘偶记》。

③ 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“光绪二十一年乙未”，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133页。

④ 据汤志钧先生考订，强学会成立时间应在同年十月初，本文采用此说。参见汤志钧《汪穉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》，见《文物》1978年第七期，以下简称汤志钧文。

⑤ 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（中华书局1954年版）126页。

⑥ 梁启超：《梁任公书牍》，见丛刊本《戊戌变法》四，225页。

治团体。

但是，强学会因为想求得各派人物的支持，拉进了许多杂品人物，造成矛盾重重。主要制造矛盾者为张孝谦和丁立钧。张、丁二人始而互相争斗，继而合作向帝党、维新派进攻。强学会筹组之时，原拟定以陈炽、沈曾植为正董，沈曾桐、文廷式为副董^①。张、丁一加入，就以陈炽、丁立钧、张孝谦、沈曾植为总董，而以张孝谦“主其事”^②。二个月后，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“植党营私”，谕旨令都察院查明禁。张、丁等人为自保又欲散伙。在李鸿藻、翁同龢、沈曾植、文廷式等人的奔走下，强学会恢复为官书局，由孙家鼐主管。但此时，丁立钧又处处刁难文廷式，因为孙欲请文廷式总理书局。后来，书局分四门，文廷式分管选书，但他不久就被弹劾离京，书局遂一蹶不振。

光绪二十二年二月，杨崇伊弹劾文廷式，十七日，慈禧下令，光绪颁谕，将文廷式“革职永不叙用”，“驱逐回籍”。文廷式的被弹劾，可以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。大量史料证明，杨崇伊弹劾文廷式，是由李鸿章一手操纵的。

甲午战争期间，文廷式曾上折历数李鸿章的五大罪状，请光绪“发谴”李鸿章，以“老成宿望者”代之^③，这对李鸿章来说，是不能轻易忘记的事情。战后，文廷式告假南归，途经上海，随身所带枕箱中，藏有“指陈时事”、“其语颇有侵合肥者”的奏稿草稿七篇被窃，落入李鸿章亲信之手，转交于李，李于是“密白太后”^④。

① 汪大燮：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《致汪康年、诒年书》，见《汪穉卿师友手札》，转见汤志钧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》增订本（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，以下简称《传稿》），上编《文廷式传》，注十一，34页。

②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汪大燮《致汪康年、诒年书》，转引自上引汤志钧文。

③ 文廷式：《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大臣请旨罢斥折》，见阿英《近代外祸史》142—146页（潮锋出版社1950）。

④ 顾家相《五余读书廬随笔》卷下（民国八年聚珍版），《萍乡鼎甲》；胡思敬《文廷式传》，见冈尔昌《碑传集补》（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本）卷九。

另外，据汪大燮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《致汪康年、诒年书》云：“又，正月十三日，停毓庆宫。十四，杨崇伊为合肥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，开一清单，凡三十余人。十五、六，合肥又独诣长信（按指慈禧）呈之。十八，杨即以弹芸阁章就正合肥。合肥将行有言，若辈与我过不去，我归，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？至津，又告人云：劾我诸人，皆不安矣。……”^①而同年四月八日的《张謇日记》，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：“闻二月李鸿章临使俄时，请见慈禧，折列五十七人，请禁勿用，第一即文道希（廷式）。李出京，而御史杨崇伊抨弹道希之疏入矣。杨、李戚也。”由此可以证明，李鸿章对文廷式甲午年弹劾他，一直是耿耿于怀的，在他出使俄国之前，就指使他的儿女亲家杨崇伊弹劾文廷式。而且，李鸿章在赴俄途中，还在遥控北京弹劾文廷式的事情。李系的沈能虎、盛宣怀随时给李发电报，报告具体情况^②。

至于慈禧对文廷式的痛恨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。敢于违抗慈禧意志的珍妃，曾经是文廷式的学生，这种传闻本身就令她增加了对文廷式的几分恶感。甲午战争中文廷式的言行，已使她无法忍受。战后，文廷式不得不以“回籍修墓”为借口告假南归，就是为了躲避后党咄咄逼人的攻势。文廷式回京后，积极倡导帝党与维新派联合，屡向光绪进言，应“变易旧法”、“劝帝变法维新图强”^③，加剧了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对立，这使她对文廷式等帝党人物恨之入骨。杨崇伊在奏折中，指控文廷式“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”，而所谓文姓太监，却是一年前就已发往黑龙江就地正法的太监闻德兴^④杨故意改“闻”为“文”，牵连扳引，就是要让慈禧联系文廷式

① 转引自汤志钧《传稿》《文廷式传》注九，301页。

② 参看汤志钧《传稿》上编注九301—302页。

③ 朱沛蓬：《清代鼎甲录·文廷式事略》见《全集·传记》。

④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册三十五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。

与二妃的关系。慈禧在杨折递上的第二天，迫不及待地下令将文廷式革职，并指斥文廷式“遇事生风”，平日“话多狂妄，不知谨慎”^①。可见，除所谓“交通官禁”之罪外，慈禧更恨文廷式甲午主战和战后参加维新活动。

文廷式的革职，是后党向帝党、向维新运动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。文廷式是光绪近臣、帝党骨干，又是强学会的组织者之一，是代表帝党参加维新运动的关键人物，可以说是帝党与维新派合作的中间人物。亲身经历了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叶昌炽，说杨崇伊是戊戌政局全翻的“发难”者，而文廷式是后党杀向维新运动刀刃的“首撙”者，由文廷式的革职，感到“钩党之祸，近在眉睫”^②。梁启超说文廷式革职的诏谕，“如春天起一霹雳，京师人人震恐”^③。更有人把文廷式的革职看成“戊戌政变之先声”^④。说明文廷式的革职，预示着后党将向维新运动全面反扑，是戊戌政变的序曲。

文廷式的革职，对他个人不能说不是悲剧。为了能踏上仕途，谋取一官半职，他奋斗了十几年。入仕以来，深得皇帝信任。从文廷式早期的思想来看，他是有一番政治抱负的。从他在甲午战争中和战后的活动来看，他也是一个敢于有所作为的人物。因为处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最里层，过早地夭折了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政治生命。但是，罢官以后文廷式并没有回乡养老，而是继续参加政治活动，并对维新运动表现了更大的热情。这是他的可贵之处，也是他区别于其它帝党的特色之一。

① 《清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。

② 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（上海蟾隐庐石印本，民国二十八年）戊戌八月初十日、丙申二月十七日。

③ 《戊戌政变记》60页。

④ 黄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0月影印本）81页。

二、罢官以后的活动、去向

文廷式被迫南归到上海后，以上海为据点，密切注意北京的政治动向，并与维新派、帝党继续往来，策划维新。

文廷式到上海不久，就与梁启超、汪康年、麦梦华有过叙谈。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文廷式《致梁、汪、麦书》说：“沪上淹留至五十日，为平生三十一次到沪最久之一次。非为公等别无所谓也。欢叙之乐，如何可忘？即此言说群说会为天地古今第一至言妙道矣。”^①说明他与维新派关系密切，志趣相投。文廷式还常与在上海的一些维新人士如汪康年、江标等人探讨中国的维新运动是否应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程式，是尊王讨幕，还是尊王佐幕^②。

文廷式与整个帝党和维新派一样，看不清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，积极谋求日本支持维新运动。光绪二十四年初，文廷式和郑观应、郑孝胥一起，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商讨中日合作，建立亚细亚协会。

闰三月初七日，亚细亚协会成立大会假郑观应寓所举行，由文廷式、郑观应、郑孝胥、何嗣焜为主席。与会的日人有小田切，三井、三菱两个洋行的总办，华人中有帝党张謇，维新人士江标、汪康年等等^③。亚细亚协会的宗旨，是所谓“联结同洲、开通民智、研究学术”，拟开展几方面的活动：（1）研究立宪章程；（2）兴办学

① 原件为上海图书馆馆藏，转引自汤志钧《传稿》上编，308页，《文廷式传》注二十六。

② 见东亚同文会编《对支回顾录》（日本原书房1981年6月第2版）下，875—879页。

③ 参见《兴亚大会集议记》，见《湘报》（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）六十九号。

校、藏书楼、博物馆；(3)发刊亚洲日报^①。

上海亚细亚协会后来又举行了选举议员的活动，举小田切为会长，郑观应为副会长。文廷式没有参加这些活动。四月，他匆匆南下，到了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湖南。文廷式在湘省呆了近一个月，曾与湖南巡抚陈宝箴有过谋划，积极向陈举荐维新人材。此时，北京的维新运动已进入高潮，传闻“文廷式有起用之信”^②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八月初三日，杨崇伊上折，弹劾文廷式“创大同学会，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，内奉康有为为主”，“专以诽谤朝廷为事”，请求“密拿大同会中人”^③，并请慈禧训政。初六日，上谕恳求慈禧重新训政，戊戌政变正式发动。清政府下令通缉康、梁。八月初十日，谕旨令两江总督刘坤一，署理江西巡抚翁曾桂“访拿”文廷式，“押解来京”^④。

诏捕文廷式的谕旨传开时，文廷式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他的去处，几乎不为人所知，风传他已经逃往日本去了。就连他的好友、秘

① 见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》(宣统三年香山郑氏刊本)，卷二，《学务》“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”。

② 皮锡瑞《师伏堂日记》戊戌五月初三日、五月十六日、五月二十九日，载《湖南历史资料》1959年第二期(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

③ 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》《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》，见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(中华书局1958年版)461页。

杨崇伊说文廷式“创办大同学会”云云，纯粹是捏造事实、扩大事端的不实之词。据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记载，丁酉(1897年)冬，日本横滨侨商发起组织学校，想请祖国的新学之士为教师，孙中山推荐梁启超，并代定校名为“中西学校”。康、梁推荐了徐勤，康有为又更改校名，书“大同学校”四字门额相赠。考戊戌八月十二日，御史黄桂鋆所上折说：“有徐勤等赴日本，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”，则所谓大同会，当指大同学校，较杨崇伊所说，稍为接近史实。而文廷式与大同学校，却是毫无关系。参见冯自由《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》，见《革命逸史》(中华书局1981年版)初集页48；《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，见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467页。

④ 《清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。